

1914年夏季至冬季,贵州省贵阳府贵筑县(今贵阳市)举人蓝泽熙,来到铜仁县任县知事。蓝泽熙(1881年—1917年),字述钦,号子重,原籍福建汀州府上杭县,清光绪七年(1881年、辛巳年)生于贵阳府贵筑县。蓝泽熙自幼聪明,曾经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礼部尚书、戊戌变法领袖、贵州经世学堂主讲李崧园(李端棻)的得意门生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癸卯科,蓝泽熙在贵阳考取了中国最后一科乡试的举人,曾被派去云南为官,民国后奉调回黔任安顺、铜仁等县知事。

蓝泽熙来到铜仁县任县知事后,发现铜仁的教育事业发展得极为不平衡。

铜仁的小学倒是办得挺不错的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清朝廷宣布废除科举,设立学堂,推行新学。同年,铜仁府知府陈廷梁采纳留学日本归来的周锦桐的建议,以旧育婴堂(现逸群小学西面)的房屋,创办了铜仁县的第一所小学堂:“铜仁县第一高初两等小学堂”,因学堂位于城南,老百姓俗称“城南小学”。

铜仁有句老话,叫做“穷不离猪,富不离书”,但凡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,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学堂读书,否则,就变成老话讲的:“养儿不读书,等于养头猪”了,所以城南创办了小学后,城北的百姓也十分希望能在城北也办一所小学,好让自己的子弟就近入学。

两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卢德楠(号小湘)由日本留学归来,任铜仁县劝学所总董。翌年,应城北父老乡亲之请,创办了“铜仁县第二高初两等小学堂”,学制也是各3年。因学堂位于城北,老百姓俗称“城北小学”。

宣统元年(1909)冬,徐钟藩(号络卿)由京师大学优级师范科毕业归来,任铜仁府劝学所总董,提议创办了铜仁县女子小学堂,首任堂长孙万侨。校址设道坳上三宝宫(以前的老城关镇),次年春招初级班,3年毕业后升高级班。第一期入校新生20名,继而每年招收新生,入学女生踊跃,共有100多人。教师多由城南、城北两校老年教师兼任(1940年,该校并入城南小学,男女同校)。

城南有了城南小学和县女子小学堂,城北却只有一所只收男生的城北小学,城北女子则无校可入。民国二年(1913年),靠接商铺起家、热心公益事业的熊雨亭先生,自愿捐资兴学,在其住地当铺巷内创设“私立淑慎女子小学”,招收城北适龄女儿童,也分高初两级。因校址适中、校舍宽敞,校舍四周有竹林、古树,环境优美,是较好的校园,特别是免收学杂费,并赠送课本,为各界人士所赞誉,当年入学的女学生竟然高达100多人。校门横悬“私立淑慎女子小学”匾额,两侧对联为:“淑慎其身为端仕女,刻苦向学竞赛须眉”。校园内设有礼堂,左为办公室,右为教室,屋前还有运动场(后来女生并入城北小学后,因城北小学没有运动场,熊雨亭之子熊江淮应城北小学校长杨干民、教导主任刘绍勋的求助,将运动场捐赠给城北小学)。

然而从1905年铜仁创办小学起,到1914年蓝泽熙来到铜仁县任县知事时,时间已经将近十年,小学的发展虽然挺不错,男女学生也在逐年增多,然而小学毕业的学生都已经有了两三期了,大量的小学毕业生毕业后却无处深造。家境好并且年龄大一点的,可以去外地的中学就读,比如说周逸群和郭辉卿,就是1914年在城南小学毕业后,考入千里之外的贵阳南明中学的,家庭条件不怎么好且孩子年龄又小的,只好辍学在家,学业就此止步。

蓝泽熙在贵州经世学堂的受业恩师李端棻,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家,他是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的首倡者,有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美誉,特别是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充军新疆的李端棻遇赦回到贵阳后,主讲贵州经世学堂(原贵阳国学书院,贵州大学的前身),对推动近代贵州教育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在李端棻言传身教的影响下,蓝泽熙本来就非常重视地方上的教育事业,更何况大量的铜仁子弟小学毕业后,深造无门,不仅铜仁的父老乡亲很忧虑,蓝泽熙也意识到这是他在铜仁县知事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,便决心在铜仁办一所中学。

蓝泽熙把自己的想法同铜仁的地方人士余舜钦、周锦桐、徐约庵、黄仲衍、周淑文等人商量,大家都非常支持,纷纷出谋划策,对校舍、师资、办学经费等,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,比如说校舍的问题,地方绅士就建议用原来的铜江书院现成的房屋。

铜江书院原来是铜仁县的县衙,光绪九年(1883年),铜仁县搬迁到了大江口,县衙被当年重任铜仁府知府的王宪曾借去作了都司署,到了光绪十七年的仲冬八日(1891年12月8日),知府冯鑫鹏重开老东门,同日,兴工移原在傅家山的铜江书院作都司署,以铜仁县所遗旧署,经前守王宪曾借作都司署那些房屋,改为书院。

光绪二十三年,四川成都府华阳县陈廷梁来铜仁府任知府,看到由铜仁县署改建的铜江书院因为年代久远,“摧颓圯芜”,于是便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秋动工,“沿袭旧址,圭地弗劳。采楹栢棖,不弃柔翰。移改曩陋,葺而新之”,到第二年冬完成,修葺后的铜江书院“计讲堂五楹、诸生斋四十、藏书楼一、崇文祠当其阳,厅、堂、室计十有叁,垣墙阶阶、门窗窗櫺悉新之。”这样规模的房屋,用来办一个中学完全绰绰有余。

正当蓝泽熙积极筹建铜仁的第一所中学大体有了一定眉目时,不料这年冬天,因母亲病故,在那个百善孝为先的时代,蓝泽熙不得不辞掉铜仁县知事的职务,返回贵阳“丁忧”守制。

蓝泽熙离任后,民国四年春季,河北的桂福来接任知事,铜仁的地方人士余舜钦、周锦桐、徐约庵、黄仲衍、周淑文等,纷纷向桂福反映铜仁创办中学的事由,要求县知事向省政务厅申请创办中等学校,并于当年秋获准。于是便将铜江书院改为“贵州省镇远道立第二中学校”(因铜仁属镇远道辖治,镇远已有道立一所中学,故名二中)。道立二中于当年八月,第一次招生,就招到新生六十名。继而,每年招生一班,学制四年,按部颁中等学校课程标准设置课程。

道立二中是铜仁新型中等学校的开端,亦为铜江书院的延续。由于邻县松桃和江口没有中等学校,两县学生多就学于此。道立二中成为铜、松、江三县学子就学的园地。由于她直接关系到三县人才的培养,故集中三县人力和财力,共图发展教育事业,经商得松桃、江口两县同意,办学经费按四、三、三比例分摊,即铜仁四成,松桃、江口各三成,同时把镇远道立第二中学更名为“第三联合中学”,

筹建铜仁第一所中学的蓝泽熙

刘新华

也称铜、松、江三县联中。

民国十六年,省溪县(今万山)自愿把冷风洞矿产产权送给学校,成了由铜仁、松桃、江口、省溪四县联办的中学,于是,第三联合中学又更名为“贵州第四联合县立中学”。办学经费仍按四、三、三比例分摊,再加上省溪冷风洞矿区收入,经费较前充裕。四县学子共聚一堂,刻苦攻读,互相勉励。教师热心教学,学校兴盛。

正当四县联中发展之际,贵州军阀周西成、李晓炎为争夺政权,于民国十七年发动大规模混战。李军前后三次包围铜仁城达四十余日,周军守城缺少燃料,拆烧学校房屋。将图书、仪器弃之不顾。战后学校一片瓦砾,教师失业,学生失学,战火将经多年努力创立的初具规模的中等学校毁于一旦。后经学校领导多方奔走求援,借得城南小学两间教室复课,使两班六七十名学生幸免辍学。尽管学校复课,而教学设备却一无所有,经费全由铜仁一县负担,“联立”徒具虚名。经费极度困难,教职工薪俸无着。文史课程由本地教师义务任教;理化课程则因无经费聘请教师,只好停课。学校处于艰难之中。

风雨飘摇的联中艰难度日,一直到了1933年,杨柏梅从北京私立朝大归来,被聘任教。至此各科教师初备。但是,教室及办公室设备缺乏与办中学的条件不相适应,于是重建校舍成为当务之急。到民国廿四年张校长委杨干民、杨柏梅和熊江淮为募捐代表,杨干民兼校舍建筑主任。向地方人士发起募捐,得到时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夫人万淑芬女士捐银一千元,万世炯(字敬章)、蒋德铭各捐银五百元,在原址重建校舍。次年秋落成。新校舍砖木结构,三层楼房,宽敞明亮。一、二层为教室,教室之间夹以办公室,三楼作学生寝室。

此时在外读大学的徐嗣侨、温美生夫妇以及曾纪烈、黄仲平等相继回到故乡,均被聘任教,后各科设专任教师。于是学生逐渐增多,除四县学子之外,毗邻湖南晃县学生来此就学者为数不少。班级由两班增至六班,并增设女班。教师队伍壮大,教学质量提高,学生人数大增,学习空气浓厚,学校面貌大为改观,致使联中得到新的发展。

1936年,改由铜仁专署专员熊璠兼任校长,原任校长张建安以名誉职领薪。实际是由杨干民代理校长,负责行政管理工作。学校经费经熊璠出面协商,仍按原定的四、三、三比例由铜、松、江三县分担,冷风洞矿产收入仍归学校所有。

1938年,贵州省教育厅“空降”教育部教育工作团教员胡朝惠来联中任校长,新任铜仁县县长吴星汉,惟恐学校不肯移交,派县保警队随胡去校接任。保警队将学校四面包围,校门设岗,禁止出入。正在上课的学生不知发生什么大事,惶恐万状,有的越窗跳墙外逃,遭到保警阻拦,一时秩序大乱。教师曾纪烈当即拍下现场镜头,作为吴兴汉派兵强行接管学校的证据。

学校发生的事,很快传到社会,引起地方人士和学生家长的愤怒和担心。次日,城区百姓在龙王庙集会,吴星汉被请到现场,群众向吴质问,吴理屈词穷。此时由地方人士掌握的壮丁在北教场鸣枪示威声援,会上提出罢课、罢市进行抗议。次日,铜仁县县党部书记长曾宪文去学校“慰问”,被学生轰出校门。继而学生离校罢课,一场“拒胡”学潮从此开始。

学校为了不误学时,另借城隍庙、东山寺、文笔洞等处的庙宇房屋上课。由原任教师义务执教。复因城隍庙是中区(即城区)区公所驻地,有区长白勉哉保护,又有地方上层人士曾奉卿、杨炳卿、何荆丞等给学校撑腰,吴兴汉未能直接干涉。这种局面持续长达一个多月,胡朝惠在这所空学校里,一无教师,二无学生,三无经费,只好离去,一场风波暂告结束。可是,吴星汉居心叵测,企图以“共产党嫌疑”加害教师,消息泄露出来,有的教师离开铜仁赴松桃、贵阳等地暂避风险,直到吴星汉调离铜仁才返回学校。

1939年初,地方人士和学校将吴星汉派兵强行接管学校一事,控告到镇远地方法院。杨炳卿和杨干民接法院传票去镇远与吴兴汉对质,杨干民当庭出示在现场拍摄的照片,揭示被告的野蛮行为后,法院调解,请省政府将吴兴汉调离。这场官司虽然打赢了,可是不到半年,贵州省教育厅勒令:铜松江省联立中学停办。地方人士不服,于当年秋季将联立中学改为“私立铜江中学”,由李汤丞等人在“济民盐店”基金内,划出二万元作为学校股金,按月计息作为学校经费。1941年,铜仁县政府根据“抗战建国”精神,把学校更名为“铜仁县立中学”,由县教育科直接管理,县财政拨给经费。1950年,铜仁县立中学并入省立铜仁中学,其房屋划归地区司法局、文化局等单位。

铜仁的这第一所中学,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和培养本土人才,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这所中学虽然是在蓝泽熙离任后的第二年才成立的,但是铜仁人民没有忘记蓝泽熙为创办这所中学所付出的心血,铜仁县政协文史委根据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的资料,在《铜仁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中的《1911年—1949年铜仁历任知府、知事、县长一览表》中,记下了应有的一笔:“任期年限:1914年夏—1914年冬,姓名:蓝泽熙,别号:子重,衔称:知事,籍贯:贵阳,备注:创办道立第二中学,成绩颇著。”我后来在《铜仁市志·政权·民国时期铜仁历任知府、知事、县长名录》中,也记下了:“姓名:蓝泽熙,籍贯:贵州贵阳,职务:知事,备注:创办道立第二中学。”之所以没有照录“成绩颇著”四字,是因为当时受志书不作评价的规定所限制。

蓝泽熙返回贵阳丁忧期间,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,先是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,发生了云南首义贵州紧随其后的护国运动,蓝泽熙受戴戡之邀投入到讨袁护国的革命潮流之中,任戴戡领导的“护国右翼军”军法处长,军需处长职。随后又参加了有“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悲壮篇章”之称的护法战争,并与戴戡、军事主官熊其勋等人一起,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,时蓝泽熙年仅36岁。

蓝泽熙育有两男三女。长子蓝端淑,早年北大毕业,后返筑先后任贵州省立中学校长,省图书馆馆长等职。抗战时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贵阳时,是他一手经办转移安置的。次子蓝端敬,云南大学外语系毕业。抗战时曾任远征军美军联络处翻译。解放后长期在贵州省水利部门工作,系资深工程师。小女儿蓝淑华,1942年大夏大学毕业,一生从事教育事业。晚年由贵州科学院以副研究员退休。曾入选中国图书馆名人录。

站在黄河岸,干渴的风裹着泥沙的温厚,拂过异乡人的心尖。我从乌江的湿润里走来,却被兰州的苍凉与热忱深深牵绊。

看黄河浊流奔涌,如母亲负重的血脉,不施舍清流,却以全部身躯哺育大地;望夜色里霓虹染亮河面,中山桥藏着百年时光,水车轻转唱着岁月的歌。黄土山的荒寂藏着坚韧,兰州人的从戎裹着温暖,三泡台的甜、长跑的劲、干净的街巷,都成了心底温柔的印记。

久旱的微雨落下,凉透骨髓,那是黄河赠予最珍贵的温柔。我攥一枚黄河石,把兰州的风、黄河的浪、这座城的烟火与深情,悄悄藏进心底。纵使千里归乡,黄河的海声、兰州的暖意,仍会在梦里流淌,成为此生难忘的眷恋。

黄河边干渴的风

德江的风是软的,吹在乌江岸边山腰上,清凉半辈子。而兰州的风是干的。它从黄土高原的脊背上滚过来,擦过我的脸,像一块粗粝的布,要把皮肤里最后一滴水珠都收走。

我站在黄河岸边,看一艘游艇呼啸着犁开水面,浪花溅起来,又被风撕碎。它跑得太快了,快得像这座城市——我还没来得及及辨认方向,汽笛声就消失在下游的弯道里。只有水痕在阳光下闪了闪,旋即被新的浑浊吞没。

我弯腰捡起一枚鹅卵石。它圆润,冰凉,躺在掌心,像一滴凝固的时间。无数个汛期打磨过它,洪流裹挟过它,而此刻它安静得像一个被遗忘的承诺。我把石头攥紧。干燥的空气从指缝间穿过,带走了什么,又留下了什么。

德江的雨还下吗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今夜我要枕着这枚黄河石入睡,梦里或许会有一条更慢的船,载着我,逆流而上。

黄河的水

黄河真黄。泥沙翻涌着,稠得像融化的土地,看不见河底,看不见鹅卵石,只看见一脉浑浊的、沉重的肉身,缓缓地、决绝地朝东挪移。

这是第一次遇见黄河。从德江山里来,千里辗转,却先撞上了这条大河。可兰州缺水——酒店的花洒嘶哑着,淌出的水细得像断线的泪。黄河吝啬么?它穿城而过,却不肯分一滴清流给岸上的人家,只管自己赶路,赶向海。

但走在河边,我闻到了香。不是花香,不是草香,是那种温热的、敦厚的、带着泥土腥气的香。忽然明白了——那是母亲流动的乳汁。浑浊,因哺育太久;沉重,因负载太多。它不施舍,因为它本身就是舍。水小,是母亲的贫;水浊,是母亲的累。

站在这里,我不是异乡人,是归来的孩子。黄河无语东流,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

黄河上的景

兰州的干燥,总让我怀念南方那些湿漉漉的雾。雾里的乌江百里画廊,是大自然随手挥就的写意——青山淡淡一抹,碧水静静一湾,栈道弯弯绕绕,像句读不清的长诗。而兰州不同。这里的黄河从青藏高原俯冲下来,怀里揣着黄土高原的泥沙,浑黄如一碗熬了千年的汤药,厚重得让人想一饮而尽。

可我最爱她的夜晚。

傍晚,我站在白塔山上,风从河面爬上来,凉中带腥。山下,兰州正一寸寸亮起来——先是几点灯火试探着睁开眼,接着千万盏灯像约好了似的,哗地全亮了。黄河在这一刻变了模样:白日里那浑黄的、沉郁的河,被两岸霓虹一染,竟成了一条流淌的金色绸带,柔软、温暖,懒懒地穿城而过,仿佛要把整座城的梦都驮在背上。

几座大桥横跨河面,此刻全披上了华彩。灯珠勾勒出桥的骨骼,车流穿梭如织,光带在夜色中缓缓流动,璀璨得像不眠的街市。最动人的还是那座中山桥——铁骨铮铮,百年岁月被人们走成了千年。桥上的行人笑语纷纷,声音刚落进河里,就被涛声一卷而走,只剩下风里若有若无的回响。

岸边,巨大水车静默而立,像几位沉默的老人。那木轮吱呀、吱呀,一声接一声,慢得几乎让人忘记它在转动,可它确实在转——转过了兰州的多少代春秋,转过了黄河的多少次涨落。它守望着这条浑黄的河,像守着一个古老的号令:每一轮转动,都在轻声说——这条河,这座城,这些灯火与桥,都将在时光里,一唱,三叹。

黄河两岸的山

我走过玉溪河的翠波,那水是活的,像少女的眼波流转;我走过大犀山的绿影,山圆润得像浸透江南梅雨。可我终究走不出这一坡黄土的荒寂——它横在那里,沉甸甸的,像一无人应声的叹息。

黄河,你日夜流着,流着浑黄的水,湍急的、浑浊的,仿佛永远在赶路,可你为何不肯为两岸的山留一点绿?哪怕只是一点点。那一棵树,枯着枝,像大地伸向天空乞讨的手,苍老、干裂,指节弯了,却什么也抓不住。野草匍匐着,贴紧了地面,使尽了力气也吐不出半粒新芽——它们的根,怕是在土里哭了很久。

我走过刘家峡的峡谷,站在大坝上。太阳烤着脊背,像一块烧红的铁贴上来;风刮着沙土,打在脸上生疼。这山,竟像是死去了多年。听不到鸟鸣,看不到鲜花烂漫,路边少见的树木都是要死不死,叶是黄的,枝是折的,没有一丝朝气。山是哑的,地是干的,连空气都懒得流动。

黄河,你怎么这样吝啬呢?你只顾自己奔涌,从高原一路呼啸而下,头也不回。却叫两岸的山活成了这般模样——不生草木,不养生灵,连少有的石头都晒得发白,像一堆堆白骨散落在坡上。风一吹,沙土扬起来,模糊了天地,也模糊了我眼里的光。

我把千里之外的那片绿意含在嘴里,像含着一片湿润的故乡。可怎么也咽不下去——它太远了,远得像一个再也做不完的梦。



张运典



黄河边上的人

傍晚,我漫步在黄河边上。一股热燥燥的风扑过来,像一条看不见的舌头,舔着我的脸。

我忽然想起千里之外的玉溪河畔——几个狐朋狗友,端着冰凉的啤酒,猜拳、笑骂,一句“烂光儿”能从黄昏扯到天亮。那时来的风,是湿的,是软的,像贵州的山。

可兰州人不一样。成群的男女来到黄河岸边,守着这条浩浩荡荡的大河,像守着一位老母亲。他们品着暗红色的三泡台,茶里有茶叶、桂圆、红枣,他们嗑着瓜子,说着笑着,讲那些讲了八千年的故事。讲着讲着,他们就笑了——因为那三泡台,是真的很甜。

霓虹灯亮起。走进一家便利店,向店主要一个玻璃杯:“空气干燥,买个杯子泡茶喝……”

老板拾起头,问了一句:“你来自哪里?”

我说:“来自贵州,梵净山下。”

老板的眼睛亮了一下,话匣子就打开了:“我们这里好,夏天最高三十多度,冬天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,这里安逸……”能看出他爱黄河,爱得死去活来。

清晨,我闲逛到黄河边的绿色公园。晨跑的人来来往往,穿着紧身运动服,把自己投进汗水里。兰州人把健康看得比麻将重千倍——那不是责任,是活法。

几位环卫工人弯着腰把路边少有的垃圾和尘土扫成一小堆一小堆。整个公园干干净净。在德江,扫走的常常只是那些“显眼”的垃圾。

可黄河边上的人们,没有和德江比较。

他们只是活着。在这片被许多人视为荒芜的土地上,活出一种干净、文明的样子。

黄河的雨

兰州,你是黄土捏成的汉子,连喉咙里都藏着干旱的印记。我本是听惯了四月絮语的德江人。在德江,雨是寻常物,四月的雨更是缠绵,像情人的耳语,没完没了,却又让人心安。可来到你身边,我才真正懂得——什么叫春雨贵如油。

等了六天六夜。黄河在脚下沉默地流,流着泥沙,流着干渴,流着一座城焦灼的呼吸。水是浑黄的,像是大地的血脉,却怎么也解不了岸上的渴。我站在岸边,看河风卷起尘土,扑在脸上,干涩得发痒。天一直是灰蒙蒙的,却不是要下雨的那种灰,而是一种固执的、不肯妥协的干。

在兰州市人大培训中心学习的第六天。要说是学习,其实没太用心,漫长的六天不过是一场等待——等待一滴雨。晚饭后,我们沿着金昌北路闲逛,沿街绿化带上的草木都耷拉着叶子,像一座城都在低头祈雨。

终于,天空压低眉头,几滴雨像断线的泪,吝啬地落下来。落在脸上,凉得让人心疼。那凉意顺着皮肤渗进去,竟像是渗进了骨头里。路上赶路的老人笑了,那笑容从深深的皱纹里溢出来,像干裂的土地终于等来了一滴水;忙于赶路的情侣停下脚步,仰起头,张开嘴,像接住从天而降的碎金;沿街的行道树刚吐露新芽的树枝在微风中摇摆,似乎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施舍。

我继续走着,任这稀薄的雨打湿衣襟,微风拂过带来丝丝凉意,再不是往日燥热的感觉。

夜深了,窗玻璃上传来雨滴的敲击声,忽然感觉到身上的那一点湿意还在,凉凉的,提醒着我——这是黄河边最奢侈的施舍。

不是大雨滂沱,而是久旱之后,那几滴,恰好落进心里的雨。